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Zhangjiajie on Changde Tourism Development

Wang Yahui¹, Peng Baofa^{2,*}, Zhao Di²

¹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China

²School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China

Email address:

wangyahui2000@163.com (Wang Yahui), pengbaofa@163.com (Peng Baofa)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ahui, Peng Baofa, Zhao Di.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Zhangjiajie on Changde Tourism Develop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 No. 1, 2019, pp. 1-9.

Received: September 11, 2019; Accepted: October 17, 2019; Published: October 29, 2019

Abstract: In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tourism space spillover effec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Many cities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by virtue of tourism space spillover effect. However,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effect requires several conditions. As one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tourism economy, not only depend on its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facilities reception ability,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ity traffic accessibility, usually by its neighbor city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distance with high tourism resources endowment neighbor city, and so on. Both Zhangjiaji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and Changde,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an excellent tourist city in China,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ime series data on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1993 to 2017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Zhangjiajie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hangde, a neighboring city of Zhangjiajie. Research shows that: Zhangjiajie has no tourism space spillover effect on its neighboring city (Changde) at least at pres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in Changde, there is no diversion of Zhangjiajie's foreign tourists to Changde. The reasons mainly include two aspects: The inconvenient traffic in Zhangjiajie and Changde objectively hinders the diversion of tourists from Zhangjiajie to Changde; relatively low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in Changde, as well as the disloc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core tourism products are subjectively difficult to attract Zhangjiajie's foreign touris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Changde to develop inbound tourism with the help of space spillover effect.

Keywords: Zhangjiajie, Changde, Tourism Development, Spatial Spillover

张家界对常德旅游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王亚辉¹, 彭保发^{2,*}, 赵迪²

¹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长沙, 中国

²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常德, 中国

邮箱

wangyahui2000@163.com (王亚辉), pengbaofa@163.com (彭保发), 751680974@qq.com (赵迪)

摘要: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中, 旅游空间溢出效应处处可见, 不少城市凭借旅游空间溢出效应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然而经验表明旅游空间溢出效应的实现需要若干条件。作为旅游发展空间载体之一的城市, 其旅游经济的发展, 不仅受到自身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设施接待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交通可进入性等因素的影响, 通常还会受到其近邻城市旅游资源禀赋、与高旅游资源禀赋近邻城市经济距离等因素的作用。选取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 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常德为研究对象, 运用1993-2017年的旅游发展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检验了常德的近邻城市

张家界对常德旅游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表明:①张家界对其近邻城市常德至少目前不存在旅游空间溢出效应。②常德在入境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呈现张家界具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境外游客到常德的分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张家界-常德不便捷的交通,从客观上阻碍了张家界境外游客向常德的分流;②常德相对较低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核心旅游产品选择上的错位等,使得常德市在主观上难以吸引前往张家界的境外游客。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借助空间溢出效应发展常德入境旅游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张家界, 常德, 旅游发展, 空间溢出

1. 引言

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及经济活动的逐利本质,共同驱动着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本身在空间上的流动,并形成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空间关联或空间交互作用[1-2],学者们更习惯于从经济学角度称之为空间溢出效应[3]。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并得到了长期系统的讨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较早地阐述了一个国家内不同区域间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及影响。在此基础上, Richardson将区域间的扩散(涓滴)作用称为正溢出效应,回流(极化)作用则称为负溢出效应[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呈现出了两大趋势。一是基于宏(中)观尺度探究国家间和省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Douven以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或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能够产生经济增长溢出为基本原理构建了多国评价模型[4]。Chu通过评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14%~18%的贡献来自于邻国的溢出效应[5]。López-Bazo等分别研究了欧盟内部和美国各州间的溢出效应[6-7]。李晨等考察了地理邻近等四种邻近关系对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8]。二是倾向于探讨生产要素的投入、经济活动和产业集聚等对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如, FDI、R&D、人力资本、交通设施[9-13]、产业集聚、城镇化、信息化等对区域的空间溢出是其中的主流[14-16]。这些研究为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框架,然而偏重于从宏(中)观尺度,缺乏从城市微观尺度的实证。

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从旅游视角探讨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亦日渐增多,大体遵循两种研究范式。一是“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范式,二是“其他因素促进旅游发展”范式。赵磊和王军军等均指出旅游发展通过空间溢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7-18]。李秋雨等指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溢出效应[19]。王明康等以我国287个地级市为例研究指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东、中、西部间的异质性[20]。王龙杰等指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21]。既有的旅游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虽然拓展了空间溢出的研究内容,然而绝大多数都基于在同一个区域内探讨其他要素对旅游发展的溢出效应,而忽略了不同地域空间旅游发展之间的溢出效应。在旅游发展已然成为我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推动力,以及经济系统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

一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旅游产品的对外宣传与推广等因素,还可能与其近邻城市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规模、空间距离或经济距离等因素相关。此外,旅游空间溢出现象虽已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得到了部分印证,但城市间的旅游空间溢出是否普遍性存在?城市间的旅游空间溢出又是否遵循从旅游发展优良的城市向欠优良的近邻城市溢出路径?学界对诸如此类问题尚未进行系统的探究。鉴于此,本文选取旅游资源禀赋相对更高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及其近邻城市常德为研究对象,探究张家界的旅游发展是否通过空间溢出促进了常德的旅游发展,以期常德旅游相关部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高的张家界,以及旅游资源禀赋次于张家界并与张家界互为近邻的常德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张家界与常德互为近邻。常德位于张家界东部,是张家界的4个近邻市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和常德市)之一(见图1)。

常德市中心至张家界市中心的空间直线距离仅119.6公里(百度地图测量数据),张家界管辖的慈利县曾归属常德管辖,1994年张家界建市后慈利县划归张家界管辖,选取互为近邻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容易满足地理学第一定律。第二,张家界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发展水平相对高于常德市。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同时亦是我国的重点旅游城市,是湖南省内除长沙以外被纳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两个城市之一。1992年,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全国第三批)世界遗产^①。常德虽然拥有“世外桃

^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网(<http://whc.unesco.org/en/list/?order=country>)数据显示,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六处: Imperial Pala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eijing and Shenyang (明清皇宫)、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Mogao Caves (莫高窟)、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The Great Wall (长城)、Mount Taishan (泰山)。我国第二批世界遗产名录一处: Mount Huangshan (黄山)。我国第三批世界遗产名录三处: Huanglong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 (黄龙风景名胜区)、Jiuzhaigou Valley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Wulingyuan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源”美誉的桃花源景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德丝弦等旅游资源（产品），但相对而言，不论是知名度还是美誉度均无法与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相媲美。第三，历年张家界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远大于常德市。自1993-2017年，张家界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从1993年的2.4

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32.3万人次，其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分别为同期常德接待境外游客规模的5.19倍和5.17倍（见表1）。第四，常德接待的境外游客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张家界基本保持一致（见图2）。

表1 1993-2017年张家界、常德境外游客接待规模（人次）。

张家界				常德			
年份	境外游客规模	年份	境外游客规模	年份	境外游客规模	年份	境外游客规模
1993	24008	2006	423400	1993	4622	2006	24000
1994	25616	2007	313836	1994	4898	2007	46995
1995	21903	2008	265862	1995	4223	2008	41809
1996	22876	2009	107201	1996	4443	2009	29722
1997	38892	2010	355497	1997	4060	2010	36411
1998	46568	2011	378258	1998	6876	2011	36555
1999	111908	2012	409306	1999	8167	2012	39006
2000	161380	2013	297870	2000	13715	2013	38868
2001	216516	2014	380492	2001	7475	2014	34661
2002	146966	2015	460189	2002	14436	2015	51573
2003	59332	2016	593258	2003	962	2016	51981
2004	257507	2017	322844	2004	3649	2017	62422
2005	461300	-	-	2005	2500	-	-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湖南统计年鉴》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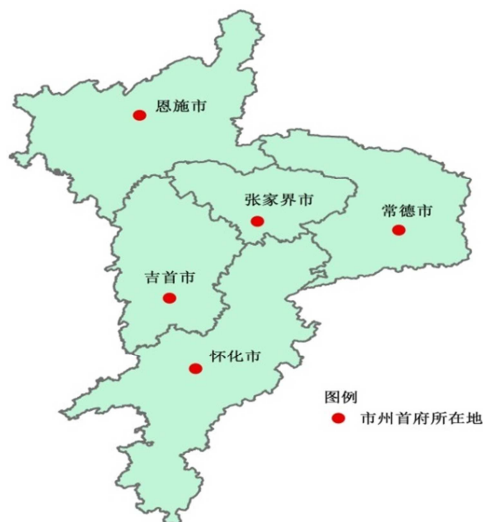


图1 张家界的近邻城市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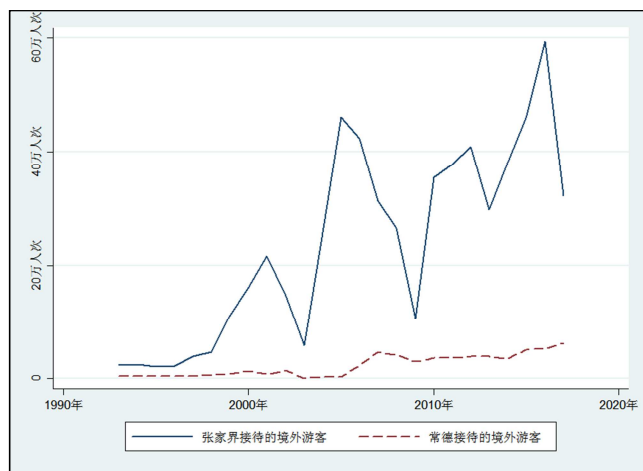


图2 1993-2017年张家界、常德境外游客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2.2. 研究假设

既有旅游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大体将空间溢出作为中介因素，并遵循两种基本研究范式：一是“旅游发展—空间溢出—经济增长”范式，二是“其他因素—空间溢出—旅游发展”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就有相关研究指出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Arrow,1962）[22]。早期探讨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指出，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可以有效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忽略了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可能导致高估区域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ritsakis,2004; Martin et al,2004; Brida et al, 2008; Fayissa et al, 2008; Soukiazis et al,2008; Tang,2011; Brida et al; 2011; 刘佳等,2013）[23-30]。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及Arrow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指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研究的视角侧重于宏观（国家）和中观（省际）层面，较少涉及微观（城市）层面（Ding,2014; 赵磊等,2014）[31,17]。近年来，从微观视角探讨城市或城市群入境旅游发展、旅游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王军军等,2016; 李秋雨等,2017; 郑玲,2019）[18,32-33]。此外，研究范式亦不再局限于“旅游发展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传统研究范式，而是扩展到了“将旅游发展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因素（如城镇化、信息化等）作为解释变量”的新研究范式（王坤等,2016; 王明康等,2018; 王龙杰等,2019）[34,20-21]。

然而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共同特点是，基于同一个区域内探讨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或其他因素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忽略了“旅游发展（区域A）—空间溢出—旅游发展（区域B）”这一可能存在的范式，

也就是说不仅一个区域的旅游或其他要素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其近邻区域(跨越了区域边界)的旅游发展亦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促使另一个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以互为近邻的张家界与常德为例,是由于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具有明显的旅游资源禀赋、入境客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是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张家界旅游发展可能对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近邻城市常德的旅游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并可能表现为入境张家界境外游客部分流向常德,进而促进常德入境旅游的发展。鉴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地理学第一定律[35],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 张家界旅游发展对常德的入境旅游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促进了常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增长。

2.3. 变量构造

2.3.1.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虽然空间溢出往往表现为一个区域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投资,而对另一个相邻或相近的区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例如,一个区域在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人才储备等方面的投资不仅提升了本区域的旅游接待能力,可能这种投资对与其相邻的地区产生示范效应,促使该区域亦进行效仿。然而,本文所指的空间溢出,指一个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高的区域,对另一个与之相邻或相近、且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低的区域旅游接待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所欲探讨的空间溢出具体的指,张家界(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高)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对常德(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低)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将“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Y_{i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FVI_{jt})”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相应数据来自《湖南统计年鉴》。

2.3.2. 控制变量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可能与常德市的交通便捷度、对外开放度、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设施接待能力,以及与张家界的空间邻近性等因素相关,为了尽可能准确估计张家界境外游客接待规模对常德市境外游客接待规模的影响,需要控制如下变量的影响。

(1) 常德市的交通便捷度(TRA_{it})。采用常德市的交通可进入性指数衡量。交通可进入性指数是将高速公路条数、民用机场数量、是否开通高铁、铁路(含动车)、是否拥有旅游专线等多个指标,通过赋权的方法综合而成的一个量化的指数。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景区景点的游览价值和市场价值能得以相互转换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使其自身的交通可进入性必须达到良好水平以上。本文选取常德的高速公路长度、民用机场规模、旅游专线以及动车是否开通等交通相关指标来衡量常德市的交通便捷度,通过赋权方法中最常使用的变异系数法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各项交通指标的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v_i = \frac{\sigma_i}{\bar{x}_i} (i = 1, 2, 3, 4) \quad (1)$$

式(1)中, v_i 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标准差系数; σ_i 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 \bar{x}_i 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1, 2, 3, 4分别代表常德的高速公路长度、民用机场规模、旅游专线以及动车是否开通。然后运用下列公式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w_i = \frac{v_i}{\sum_{i=1}^n v_i} (i = 1, 2, 3, 4) \quad (2)$$

(2) 常德市的对外开放度(OPE_{it})。既有研究已证实,一个区域的对外开放度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该区域的境外游客接待规模(Lloyd, 2002; 杨丹萍等,2011; 胡天宇等,2014; 王亚辉等,2017) [36-39]。借鉴谢守红(2003)、徐冉(2012)、吕瑶和蒋晓梅(2015)等人的测度方法[40-42],运用外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常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和外贸依存度(常德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常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常德市的对外开放度,测算公式为:

$$\text{对外开放度} = \text{外贸依存度} + \text{外资依存度}; \quad (3)$$

$$\text{外资依存度} = \text{外商直接投资额} / \text{地区生产总值} \quad (4)$$

$$\text{外贸依存度} = \text{进出口贸易总额} / \text{地区生产总值} \quad (5)$$

(3) 常德市的旅游资源禀赋(HER_{it})。既有相关研究表征一个区域旅游资源禀赋高的方法通常有“A级或3A级(张燕,2012; 单德朋,2012) [43-44]、5A级以上景区(点)数量(郑鹏,2015) [45]”。然而,就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而言,世界遗产类旅游资源和5A级景区(点)对游客的吸引力要显著强于A级或3A级旅游景区(点)。因此,本文用“常德市是否拥有5A级景区(点)或世界遗产”衡量常德市的旅游资源禀赋,若常德市在某年有5A级景区(点)或世界遗产,则取值1,否则取值0。该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

(4) 常德市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HOT_{it})。大多数跨国旅游者希望目的地提供安全、方便和舒适的旅游接待设施(邵诚,2006) [46]。其中,旅游住宿设施又是旅游接待设施的主体,旅游住宿设施中的“星级酒店”又是旅游接待设施中具有较高舒适度、便捷性和安全性的代表,是衡量区域入境旅游接待能力的最常用指标之一(郑鹏,2015) [45]。虽然部分相关研究在探讨“旅游接待能力”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时,将星级酒店、国际旅行社,以及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共同纳入了入境旅游影响因素模型。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国际旅行社数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地的旅游接待能力,但是与要求旅游接待设施舒适、方便和安全更相关的是“星级酒店”数量。至于旅游从业人员的数量,虽然与旅游接待能力有关,但是与一地旅游接待能力更相关的是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而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这一指标,在我国现有的统计出版物中暂未作相应报告,如何衡量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标准。综合权衡,本文用“常德市的星级酒店数”衡量常德市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

(5) 张家界市与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 (DIS_{ijt})。旅游客流随距离增大而衰减,在理想化的旅游系统里,客源地与目的地的交通距离是影响游客到访的唯一因素(吴晋峰等,2005)[47]。实证研究中学者对距离的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的分歧,其中,地理空间距离(Edwards,1998;郭为,2007;臧良震等,2011;王亚辉等,2017)[48-51]与时间距离是主要分歧之处。在过去交通欠发达的时代,地理空间距离确实影响更大,然而在交通发达的当今时代,绝对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距离对游客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已逐渐减弱,随着时间对于

人而言稀缺性的加强,游客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时间距离对游客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变得更强。故而本文使用张家界到常德的汽车旅行总时长(单位小时)测量张家界与常德的空间邻近性更合适。

2.4.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高旅游资源禀赋区域(张家界)对其邻近区域(常德)旅游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结合上述变量构造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Y_{it} = \beta_0 + \beta_1 FVI_{jt} + \beta_2 TRA_{it} + \beta_3 OPE_{it} + \beta_4 HER_{it} + \beta_5 HOT_{it} + \beta_6 DIS_{ijt} + u_i \quad (6)$$

式(6)中,下标*i*、*j*分别表示城市常德和张家界;*t*表示年份,取值为1993-2017; Y_{it} 表示常德市在*t*年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FVI_{jt} 表示张家界在*t*年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TRA_{it} 表示常德在*t*年的交通便捷度; OPE_{it} 表示常德市在*t*年的对外开放度; HER_{it} 表示常德市在*t*年的旅游资源禀赋;

HOT_{it} 表示常德市在*t*年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 DIS_{ijt} 表示常德与张家界在*t*年的空间邻近性; $\beta_0 \sim \beta_6$ 表示待估参数; u_i 表示随机扰动项。式(6)中各变量的数据形式及测度方法详见表2。

表2 模型(6)中变量的定义、数据形式与度量方法。

变量	定义	数据形式	度量方法
Y_{it}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对数	/
FVI_{jt}	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对数	/
TRA_{it}	常德市的交通便捷度	综合指数	常德市高速公路长度、民用机场规模、旅游专线以及是否开通动车等指标通过赋权综合合成的一个量化指数
OPE_{it}	常德市的对外开放度	比值	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
HER_{it}	常德市的旅游资源禀赋	{0,1}	若常德市在 <i>t</i> 年有世界遗产或5A级景区,则取值1,否则取值0
HOT_{it}	常德市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	对数	常德市在 <i>t</i> 年的星级酒店数量
DIS_{ijt}	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	对数	张家界市中心到常德市中心的汽车旅行时长(小时)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 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3.1. 变量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初步掌握各变量观测值的集中与离散趋势,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常德市与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差距较大,均值差距达10倍以上,

说明张家界对境外游客的吸引力远远强于常德市。此外,虽然常德市目前暂未开通高铁,但整体而言其交通便捷度在不断提升,由于长张高速(长沙至张家界)公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张家界至常德的汽车旅行时间,据测算,从张家界至常德的汽车旅行时间由长张高速开通前的5小时缩短至现在的平均2小时左右(见表3)。

表3 模型(6)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Y_{it})	25	22961.160	19446.200	962	62422
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FVI_{jt})	25	236111.400	170813.800	21903	593258
常德市的交通便捷度 (TRA_{it})	25	1.427	1.230	0.434	5.367
常德市的对外开放度 (OPE_{it})	25	0.028	0.008	0.015	0.048
常德市的旅游资源禀赋 (HER_{it})	25	0	0	0	0
常德市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 (HOT_{it})	25	29.640	17.762	2	51
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 (DIS_{ijt})	25	3.320	1.413	2	5

3.2.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探究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方法。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张家界与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进行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变量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且相关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4)。

表4 张家界与常德境外游客人数的皮尔逊（Person）相关矩阵。

		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Pearson相关性	1	0.7000**
	显著性（双侧）	-	0.000
	样本	25	25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Pearson相关性	0.7000**	1
	显著性（双侧）	0.000	-
	样本	25	25

注：本文运用SPSS软件计算整理，**表示在0.01显著性水平（双侧）上显著。

值得指出的是，相关分析仅能揭示张家界市与常德市境外游客接待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方向，而无法考察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是否对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产生影响，更无法测量影响程度（Wooldridge,2013）[52]。因此，需要借助回归分析。首先，对式（6）进行静态OLS(Ordinary Least Square)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的回归系数为0.125，意味着当张家界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每提高1个百分点，常德接待的境外游客规模平均将增加约0.1个百分点。虽然效应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用“张家界市中心至常德市中心的汽车旅行时长”衡量的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的回归系数为-1.445，表明张家界与常德的空间越邻近（汽车旅行时长越短），张家界的旅游发展越有可能促进常德境外游客规模的增长，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三，其他变量（常德市

的交通便利度、对外开放度、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设施接待能力）的回归系数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0000，说明模型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见表5静态OLS回归结果）。

为了提高变量回归系数估计的稳健性，进一步对式（6）进行动态OLS回归，即将被解释变量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的滞后值（本文取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进行动态OLS回归后，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以及统计上的显著性与静态OLS回归一致，所不同的是各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发生了变化。其中，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对常德市境外游客接待规模的效应值由原来的0.125提升到了0.355，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1.445下降为-8.867（见表5静态OLS回归结果）。

表5 变量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静态OLS回归	动态OLS回归
张家界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 FVI_{it} ）	0.125 (0.415)	0.355 (0.476)
常德市接待的境外游客人数的一阶滞后（ FVI_{it-1} ）	-	0.268 (0.255)
常德市的交通便利度（ TRA_{it} ）	0.414 (0.617)	0.446 (0.632)
常德市的对外开放度（ OPE_{it} ）	43.975 (25.960)	28.737 (31.277)
常德市的旅游资源禀赋（ HER_{it} ）	0.019 (0.322)	0.088 (0.347)
常德市的旅游设施接待能力（ HOT_{it} ）	0.061 (0.284)	0.154 (0.314)
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空间邻近性（ DIS_{ijt} ）	-1.445 (0.865)	-0.867 (1.035)
截距项	10.443 (5.550)	4.502 (7.953)
R^2	0.728	0.738
观测值	25	24
联合显著性检验	F(7,17)=7.70, $p=0.000$	F(7,16)=6.46, $P=0.001$

注：圆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系数估计的标准误。

通过上述静态和动态OLS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张家界旅游发展对常德旅游发展至少目前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张家界与常德虽然互为近邻，且张家界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在境外游客接待规模上较常德具有绝对优势，但张家界至常德不便捷的交通（张家界至常德目前尚未开通高铁，游客乘坐火车从张家界至常德最快亦需要2小时22分，游客乘坐汽车从张家界至常德在高速公路上的耗时也在2小时以上）客观上阻碍了张家界境外游客向常德的分流。其次，常德相对较低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旅游产品打造及宣传上的欠缺主观上难以吸引前往张家界的境外游客。前往张家界旅游的境外游

客，其目的大多是一睹世界自然遗产的风采。常德即便拥有文化底蕴深厚的桃花源景区，但桃花源景区在针对境外游客的宣传上可能不到位，或者桃花源景区在产品打造时过度偏离了早已在游客心目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世外桃源”形象，使得游客对桃花源景区的品质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产生了“马太效应”，进而最终导致境外游客缺乏到常德桃花源景区旅游的动机。

此外，常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核心旅游产品的选择及打造上偏离了方向，使得主观上难以吸引前往张家界的境外游客。对于常德而言，最有地域特色的旅游资源应该是根植于常德的资源，如陶渊明文化、抗战文化以

及丝弦文化等。从目前的开发现状来看,首先,陶渊明文化挖掘略显不够、展现形式过于老旧;其次,抗战文化目前的展现方式限于在常德博物馆的“常德会战厅”,系统性和规模性均有待提升;第三,以常德丝弦为核心的丝弦文化,存在“重保护(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应用”的倾向,在将其打造为类似于“印象刘三姐”、“天门狐仙”一样的大型演艺产品上做得远远不够。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张家界是中国的重点旅游城市,是湖南省仅有的两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张家界凭借其世界自然遗产而享誉国内外,并成为境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既有研究表明,一个旅游发展优良的城市往往对其近邻城市的旅游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张家界对其近邻城市(常德)旅游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张家界旅游发展对常德旅游发展至少目前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可能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第一,张家界-常德不便捷的交通,从客观上阻碍了张家界境外游客向常德的分流。张家界与常德虽然互为近邻,但截至目前两城之间尚未开通高铁,游客往返两城目前相对最快捷的交通方式是长张高速公路,按大巴车的行驶速度核算,从张家界到常德需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约2小时,如果将市区行驶时间包括进去,至少需要3小时以上。此外,根据“中国铁路12306”官网数据显示,常德至张家界目前有3趟列车,分别是K810、K6594和T8322,其中耗时最短的T8322亦需要2小时22分。第二,常德相对较低的旅游资源禀赋主观上难以吸引前往张家界的境外游客。前往张家界旅游的境外游客,其目的大多是一睹世界自然遗产的风采,常德虽然拥有文化底蕴深厚、客观上与张家界自然风光形成鲜明互补性的桃花源景区,但该景区的对外宣传可能不到位,或者因境外游客心目中的桃花源景区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存在较大差距而产生了“马太效应”,进而最终导致张家界入境旅游发展目前未对常德入境旅游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4.2. 主要启示

常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早在1986年就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然而多年来,常德的入境旅游一直止步不前,是困扰常德旅游经济发展的悠久的现实问题之一。为了促进常德入境旅游的发展,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吸引前往张家界的境外游客来实现,然而这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应尽早开通常德至张家界的高铁,缩短张家界至常德的通达时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是旅游产品的差异化以及差异化营销,与张家界的自然风光相比,常德的陶渊明文化、抗战文化、丝弦文化是最有互补性的旅游资源,相关部门应重点挖掘和打造陶渊明文化产品、抗战文化产品和丝弦文化产品。就陶渊明文化产品的挖掘而言,应以桃花源景区为核心载体,尽可能再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从抗战文化产品的打造而言,可以考虑以“常德会战”为主要题材,修建

一个专门的“常德会战”纪念馆,全方位、多形式的展现常德会战中的抗战故事。就丝弦文化产品而言,目前重点做的工作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应有的社会经济服务功能明显不足,未来可以借鉴“印象刘三姐”、“天门狐仙”等舞台剧形式,将常德丝弦舞台化,以演艺形式向游客开放,既能传承丝弦文化,又能促进常德旅游经济的增长。就对境外游客的营销角度而言,未来上述产品包装完后,可以选择张家界的主要交通枢纽地(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张家界火车站)进行户外和室内的立体式营销,以提高产品在境外游客心目中的知名度。

致谢

感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571116)、中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湘教通〔2015〕351号)、中国湖南省应用经济学应用特色学科资助(湘教通〔2018〕469号),以及湖南文理学院重点项目“城市旅游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无编号)”给予资金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Henderson J V, Shalizi Z, Venables A J.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1).
- [2] Overman H G, Rice P, Venables A J. Economic linkages across space [J]. Regional Studies, 2010 (1).
- [3] Richardson H W. Growth pole spillovers: The dynamics of backwash and spread [J]. Regional Studies, 2007 (S1).
- [4] Douven R, Peeters M. GDP-spillovers in multi-country models [J]. Economic Modelling, 1998 (2).
- [5] Chua H B. Regional Spillovers and Economic Growth [R]. New Haven: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1993.
- [6] López-Bazo E, Vayá E, Artís M. Regional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4 (1).
- [7] Baicker K.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2).
- [8] 李晨,覃成林,任建辉.空间溢出、邻近性与区域创新[J].中国科技论坛, 2017 (1)。
- [9] 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 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 2010(6)。
- [10] 王铮,马翠芳,王莹,等.区域间知识溢出的空间认识[J].地理学报, 2003(5)。
- [11] 李小平,朱钟棣.国际贸易、R&D 溢出和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 2006(2)。
- [12] 陈朝阳,韩子璇,李小刚.人力资本集聚及空间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现代化, 2019(3)。

- [13] 张治栋,李发莹.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9(5)。
- [14] 刘佳,于水仙.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旅游研究,2013(4)。
- [15] 周慧,苗洪亮,曾冰.创新驱动、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17(4)。
- [16] 孙琳琳,郑海涛,任若恩.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世界经济, 2012(2)。
- [17] 赵磊,方成,吴向明.旅游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旅游学刊, 2014(5)。
- [18] 王军军,杜英,王建平,等.旅游产业的溢出效应及其集群化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市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6(4)。
- [19] 李秋雨,黄悦,刘继生,等.广东省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态势[J].经济地理,2015(5)。
- [20] 王明康,刘彦平.城镇化、空间溢出与旅游经济——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18(9)。
- [21] 王龙杰,曾国军,毕斗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J].地理学报, 2019(2)。
- [22] 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1962 (80).
- [23] Dritsakis N. Tourism as a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Greece using a causality analysis [J]. Tourism Economics, 2004 (3).
- [24] Martin J, Morales N, Scarpa R.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 panel data approach [R]. Canary Islands: University of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2004.
- [25] Brida J, Carrera E, Risso W. Tourism's impact on long-run Mexican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 Bulletin, 2008(21).
- [26] Fayissa B, Nsiah C, Tadesse B. Impact of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J]. Tourism Economics, 2008 (4).
- [27] Soukiazis E, Proenca S. Tourism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regional growth in Portugal: A panel data analysis at NUTS II and III level [J]. Portuguese Economic Journal, 2008(1).
- [28] Tang C.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valid for Malaysia? A view from disaggregated tourism marke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1).
- [29] Brida J, Punzo L, and Risso W. Research note: Tourism as a factor of growth: The case of Brazil [J]. Tourism Economics, 2011 (6).
- [30] 刘佳,赵金金,张广海.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 2013 (4)。
- [31] Ding D, Alan A L, Pin T N.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4 (2).
- [32] 李秋雨,朱麟奇,刘继生.中国城市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溢出性[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7(1)。
- [33] 郑玲.长三角核心城市旅游产业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经济师, 2019(3)。
- [34] 王坤,黄震方,余凤龙,等.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J].旅游学刊, 2016(5)。
- [35] Tobler W.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46).
- [36] Lloyd P J, Maclaren D. Measures of trade openness using CGE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2 (1).
- [37] 杨丹萍,张冀.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1992-2009年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11(6)。
- [38] 胡天宇,陈芳. FDI 对安徽经济影响的动态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39] 王亚辉,全华,尹玉芳.国际友城的入境游效应:来自中国38个客源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 2017(3)。
- [40] 谢守红.中国各省区对外开放度比较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03(3)。
- [41] 徐冉.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1)。
- [42] 吕瑶,蒋晓梅.东北三省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张燕.基于引力模型的广西入境游客流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 2012(10)。
- [43] 单德朋,朱沁夫.中国滨海旅游城市入境游客流流量及潜力[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 [44] 郑鹏.旅居者城市旅游空间行为的文化影响研究[J].地理科学,2015(9)。
- [45] 邵诚,黄思婧.跨国旅游偏好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发展研究,2006(8)。
- [46] 吴晋峰,包浩生.旅游距离衰减现象演绎研究[J].人文地理,2005(2)。
- [47] Edwards S. Openness,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at do we really know? [J]. Economics Journal, 1998 (447).
- [48] 郭为.入境旅游: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2007(3)。
- [49] 臧良震,陈方,李植鹏.基于引力模型的云南省国际入境旅游客流量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 [50] 王亚辉,吴云超.签证制度与入境游客流: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旅游科学, 2017(5)。
- [51] 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M]. Canada: Nelson Education, Ltd. 2013.

作者简介



王亚辉(1981-), 男, 湖南安化人,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



彭保发(1963-), 男, 湖南桃源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



赵迪(1980-), 男, 河北邢台人,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数据可视化。